



列宁党风建设思想 与实践研究

李桂树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工商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BS201718)

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 实践研究

李桂树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李桂树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607-6190-9

I. ①列… II. ①李… III. ①马列主义党—党风廉政建设—研究②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研究 IV. ①D053
②D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5762 号

责任策划:陈海军
责任编辑:李艳玲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8008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2 印张 223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责任编辑 李艳玲
封面设计 张 荔

前 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深刻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定不移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之中,党的建设不仅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居于统领的突出地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搞得好,那么我们党的事业就顺利前进,兴旺发达;什么时候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搞得不好,那么我们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是失败。因此,基于自身的性质、宗旨、纲领的规定和要求,以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问题。党的作风建设攸关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攸关党的形象,攸关人心向背,攸关党的领导的实现,一句话,党的作风建设攸关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在党的建设中占有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基于此,本书的研究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并实施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为现实背景,力图通过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进一步夯实我们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并为党的作风建设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选题的目的

1. 选择党风问题开展研究的目的

第一,之所以关注并选择党风这一问题,是作风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特殊地位使然。在党的建设的总布局当中,作风建设具有重中之重的地位和作用。从其与思想建设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没有理论联系实践的学风,那么就避免不了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进而导致主观与客观相分离,思想与实际不统一。从其与政治建设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没有求真务实的思想作

风,那么正确的政治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无法制定出来,即便制定出来,也只能流于政治空谈。从其与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没有团结统一的组织作风,那么宗派主义就不可避免。由此,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无法生成,甚至很可能成为一盘散沙。从其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来看,制度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必要路径,反过来,党的作风又是制度得以维护和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良好的工作作风来支撑,那么各种制度也避免不了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从其与反腐倡廉建设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没有民主的领导作风,那么就无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那么腐败就不可避免。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的领导作风是抵制腐败的良药和廉洁勤政的基石。不仅如此,无论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纯洁性建设抑或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等,也都同样离不开党的作风建设,甚至是以党的作风建设为主要前提或表征。因此,可以说,关注并选择作风建设问题,就等于抓住了党建问题的关键。

第二,之所以关注并选择党风这一问题,是党风和社会风气之间的特殊关系使然。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对社会风气具有明显的导向、引领和示范作用。反过来,社会风气的好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党风的优劣。可以说,党风与社会风气紧密相连,时刻互动,但是在两者之间,党风无疑更具决定性意义。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和经济体制双转型相叠加,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就业方式、新的生活方式等不断涌现,人们的价值追求、文化生成、利益获得多元化的态势得以形成。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大大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尤其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化态势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何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同时,引领并充分调动激发多元的社会活力,并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健康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未能得到根本的遏制,而先富带动后富的局面尚未全面生成,再加上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如此种种,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也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并由此引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所以,只有坚持不懈并卓有成效地深入进行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密切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才能使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支持,也才能促进社会风气的不断优化。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我们党是执政

党,所以端正党风就成了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只有把党风搞好了,才能实现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说,关注党风建设问题是势所必然。

第三,之所以关注并选择党风这一问题,是当前我们党在党风建设方面面临的严峻形势使然。当前,国际、国内以及党自身的情况都在发生新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严峻考验。总的来看,当前,我们党不仅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进行改革开放的考验,而且还面临着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复杂环境的考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并解决: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怎样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怎样做到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而不变质。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怎样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下攻坚克难、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怎样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规避市场机制自身的弊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外部环境不断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如何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快速发展,如何在国际交往中取长补短、趋利避害、维护国家安全。在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我们党既要看到自身具有的优势,更要看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尤其是要清醒地看到,在部分党员中间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由于理想信念的缺失导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由于不思进取导致的能力不足的危险、由于主从关系的倒置导致的脱离群众的危险、由于使命担当的丧失导致的消极腐败的危险。而这“四大危险”无一例外地昭示着我们党的作风建设亟待加强,如果任由党内的不正之风大行其道,那么不仅会使我们党无法从容应对各种考验、规避各种危险,而且还会因其疏离甚至割裂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从而使党的执政之基面临着可能垮塌的危险境地。可以说,关注并选择党风建设问题是正当其时。

2. 选择列宁的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开展研究的目的

第一,这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使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列宁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积极回应了时代变化和工人运动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他一方面同第二国际后期的修正主义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捍卫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尊严和权威;另一方面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从科学的理论形态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不仅如此,作为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列宁还创建了第三国际,承担起领导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重任,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列宁不仅领导建立了俄国共产党,而且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生兼跨领导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所以积累了丰富的党建经验。诚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关于党的建设,“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备的建党学说”^①。毋庸置疑,俄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鲜活样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也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接受马列主义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在列宁的直接关怀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并成为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员,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直接理论基础。因此,深入研究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无疑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这是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使然。作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执政党,我们党只有保持自身的坚强有力和刚健有为,才能在不断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领导人民攻坚克难,并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为此,我们党一方面必须探索执政党建设的规律,也就是从当代各国执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中总结提炼出执政党建设应当遵循的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为我所用,以扬长避短;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借鉴、消化和吸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和教训,以趋利避害。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党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而且还因为苏联共产党和我们党同属无产阶级政党,加之国情近似,所以对我们党来说,苏共的党建经验教训更具针对性和参考价值。客观来看,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有多方面,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本身出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列宁的后继者纷纷背离了列宁的建党学说,才造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惨剧。事实上,列宁其后的苏联共产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虽然这种体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其弊端和危害也同样明显。从对苏共本身影响的角度来看,这种体制造成了党内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盛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个人崇拜、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大行其道,特别是党内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严重割裂了党群关系,致使苏共民心尽失,亡党亡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为指导,自觉加强和改善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培育和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研究列宁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党风思想与实践问题无疑是有必要的。

（二）选题的意义

1. 理论意义

第一,这是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无产阶级政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列宁也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才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思想,为我们党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这首先就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否则就无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无以实现中国化。虽然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但是中国人最终接受的是经由列宁推进到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第一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列宁的党建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列宁党风建设思想又是其党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推动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中国化显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这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的实力较之资本主义明显处于劣势。即便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一争高下的考虑,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特别是不断加速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为了配合“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有些西方政要和学者在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上大做文章。他们有的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有的别有用心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断章取义,造成两者的对立;有的否认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等等。虽然表述不同、风格各异,但是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动摇甚至摧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国家的指导地位,并由此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直至达到亡党亡国的险恶目的,实现其所谓的“历史终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所以人们极易把党的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加之西方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容易动摇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至于置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和现实合法性,并弱化甚至抛弃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求我们党自觉加强自身建设,打造过

硬的作风,以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进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基于此,深入研究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是势所必然。

2. 现实意义

第一,这是进一步增强党的先进性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回顾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我们党在不同时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才使我们党能够正确把握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才使我们党不断巩固自身的阶级基础,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并赢得了执政地位。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成不变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变化并与之相适应。以此观之,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必然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此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虽然不否认英雄人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更强调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由此可见,纵然无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但是党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仍然是一事无成。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把党的先进性落实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落实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落实到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上。而党的作风不仅是人民群众判断和甄别党的性质、宗旨的镜鉴,更是人民群众体察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标尺。因此,只有加强党风建设,打造和保持优良的党风,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才能使党的先进性进一步得到彰显,也才能使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第二,这是进一步开创党的作风建设新局面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党在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以对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直面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敢于揭短,不怕亮丑,制定并实施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略,以党风廉政建设为抓手,建章立制、纠风肃纪,出重拳,下猛药,致力于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从“八项规定”转变工作作风开始,到以“务实、为民、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再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实施,以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进行,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形成了高压态势,致使腐败分子无法遁形,纷纷落马。相信这些新举措必将对党风的根本好转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然而,诚如列宁指出

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以此观之,当前我们党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显然也不能例外,同样需要理论的指导。如果离开了理论的指导,那么党风建设的实践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党风建设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思想与我们党开展党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生成体现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的新理论,并不断以之指导新的党建工作。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背景下,深入挖掘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无疑将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进而开创出党的作风建设的新局面。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诚然,国内学界对列宁党建思想与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专门系统针对其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尚须进一步的深化。截至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开宗明义针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一类是针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中的某一方面的研究。

1. 开宗明义针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党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克服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败的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周克武、徐一飞的《列宁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渝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党风建设思想应当包括:新型党必须坚持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的作风;新型党必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新型党必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执政党要同骄傲自大和特殊化等现象作斗争,锻炼一个好的风格。如:黄飏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1年版)。有的学者把列宁的党风建设思想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廉政建设。如:袁翠的《列宁关于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探索》(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有的学者把列宁的党风建设思想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科学的、实践的理论,反对固守“本本”的教条主义;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如:赵振娇的《经典作家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新时期的发展》(《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 针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中的某一方面的研究

(1)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学界一直十分关注列宁反对官僚主义方面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列宁一直非常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并揭示了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采取了反对官僚主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显泗、黄家泉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周泳、徐世钦的《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闵宝力的《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及其历史经验》(《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4期),李俊明的《列宁论官僚主义现象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理论探讨》1992年第3期),张希的《列宁晚期的监督思想与反对官僚主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龚廷泰的《官僚主义的体制原因及其消解手段——重温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钟晓雄的《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探索》(《岭南学刊》1999年第3期),田猛的《列宁对官僚主义的透视和剖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杨海波的《官僚主义的文化探源与启示——列宁基于逻辑判断与现实选择的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2)关于密切党群关系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列宁密切党群关系的思想与实践,揭示了其现实意义和启示。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邢广成的《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李忠杰的《列宁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国际共运史研究》1990年第2期),王庆海的《列宁关于密切与群众联系的理论与实践》(《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6期),林燕的《列宁的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思想及时代意义》(《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蒯正明的《列宁关于密切党群关系的思想与现实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寇清杰的《列宁人民群众观及其当代价值》(《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10期),吴波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群众路线思想及其启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关于发展党内民主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学者们从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来源、价值诉求、实现途径、重要认识、思想辨析、思想价值、演变过程及当代启示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高放的《列宁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探索——兼评列宁晚年民主思想》(《厦门特

区党校学报》2003年第5期),司永海的《列宁党内民主思想探源》(《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顾玉兰的《列宁早期党内民主思想探析》(《学术论坛》2011年第2期),徐亦让的《列宁“无产阶级民主”思想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刘志明的《科学认识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理论学刊》2010年第4期),俞良早的《列宁由理想化民主向现实民主的思想转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5期),王进芬的《俄共(布)十大对党内民主的争论及其走向和影响》(《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2016年第5期)。

(4)关于党的团结统一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有学者认为,防止和反对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保障。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党内的各种形式的反对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出色地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不仅如此,还为预防和消除“寡头政治”带来的分裂危险设计了“集体领导”“改组工农检察院”等一系列制度方案。列宁的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与制度设计对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均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如:赵清华、苏凤超的《论列宁工人阶级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的价值观——列宁的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钩沉》(《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秦义、许斗斗的《列宁党内团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学校党建和思想教育》2015年第13期)。

(5)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列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无产阶级“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并身体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垂范全党。如:牟镜石的《学习列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唯实》1984年第4期),柳礼泉、戴晓慧的《论列宁党内批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6)关于反对空谈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注重实际,重视效果,反对一切空谈和浮夸,这种革命的求实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如:刘义泉的《列宁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求实精神》(《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党内存在着严重的热衷“革命空谈”的倾向。列宁不仅坚决反对,而且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他指出,“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革命空谈”不仅造成日益激烈的党内争论,影响党的团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使党不能集中精力于党所面临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还会使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的政策产生疑惑甚至抵触情绪。列宁强调,对执政的共产党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要“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要面向未来

和实践,不能停留于昨天和书本。如:俞敏的《列宁反对“革命空谈”的话语及思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王进芬的《列宁关于反对“革命空谈”的思想》(《学术论坛》2009年第12期)。

(7)关于反腐倡廉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机关的反腐倡廉建设,不仅揭示了腐败的危害,产生的根源、表现形式、特点,而且还为拒腐防变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原则和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他倡导廉洁奉公,并率先垂范,为党和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姬金铎的《列宁反腐败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曾光梅、曹希岭的《列宁的党政监督思想论析》(《学习论坛》2015年第12期)。

(二)国外研究现状

尽管国外政界和学界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研究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热度,甚至不乏像美国哈佛大学的阿尔弗雷德·迈耶尔这样的学者认为在列宁主义的体系中“政党理论是最重要的部分”^①,但是对列宁的党建学说方面的研究,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对列宁的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方面的论述更是寥寥无几。当然,这绝对不是说列宁的党风建设思想不重要,只不过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关注不同的突出问题以及各自不同的解读方式等等所产生的不同的认知结果罢了。事实上,诚如叶卫平在其《西方“列宁学”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西方的学者和政要更多的是在如下几个方面关注列宁和列宁主义。如: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的个性与品质问题;等等。而真正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则不甚关注,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空白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苏联的部分政要和学者的部分著述涉及一些相关内容,但是即便如此,也不都是直观的表达,有的仍需对其基本意蕴进行归纳和提炼,方得其要义。

1. 苏联政要关于列宁党风建设思想的论述

(1)在涉及列宁的党风建设思想方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斯大林在其《论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指出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就是“(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②。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的要求,“就是说,要恢复那个被破坏了的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消灭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因为

^① Alfred G. Meyer. *Leni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

^② [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页。

只有这样,才能创立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①。“要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批评,要无产阶级政党根据自身的错误来学习和接受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党的真正干部和真正领袖。”^②虽然斯大林将革命胆略、务实精神、理论联系实践和自我批评用列宁主义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呈现出来,但是结合列宁的论述来看,这些内容无疑是党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2)托洛茨基对列宁方法和力量的解读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指出:“只有把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和约、伟大的魄力与胆大心细的作风、果断精神与洞察力自然地 and 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衡量列宁的方法和列宁的力量。”^③虽然他并未直接指出这是列宁的党风建设思想,但是魄力、胆大心细、果敢和洞察力无疑是列宁对党内职业革命家品质的要求,而职业革命家无疑是党的中流砥柱。

(3)布哈林认为:“实践的观点是列宁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这个观点决不意味着忽视理论。恰恰相反,它要求十分重视理论。”^④也就是说,列宁固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加关注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这无疑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学风。

2. 苏联学者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论述

(1)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思想与实践。鉴于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积弊,R.柴卢里科夫认为:“列宁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的实践,为我们今天克服这些消极现象提供了锐利武器。”^⑤A.兹维列夫指出,研究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论述,“在以下两个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弗·伊·列宁的论点是实事求是地深入研究有关提高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的组织管理效率问题,以及克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种种表现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精确而又不打折扣地理解和阐述弗·伊·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思想,已成为有力地反驳对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思想的曲解和歪曲,特别是资产阶级对列宁有关官僚和官僚主义的错误诠释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⑥A.奥库索夫认为,列宁反对官僚主义,并特别注意到了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不仅如此,“列宁曾建议根据兵法上的所有原则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他坚

① [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页。

② [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页。

③ [苏]托洛茨基:《论列宁》,王家华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0~81页。

④ [苏]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⑤ [苏]R.柴卢里科夫:《列宁论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2期。

⑥ [苏]A.兹维列夫:《列宁论官僚与官僚主义的实质》,《苏联问题参考资料》1988年第3期。

决要求全面地克服官僚主义这个大祸害”^①。

(2)关于反对个人崇拜作风的思想与实践。针对有人提出在列宁掌控国家权力的时期存在个人权力体制和个人崇拜的问题,E.维滕贝格认为,列宁时期的党和国家实行的是集体领导的原则,任何企图个人掌权的意向对列宁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任何问题都经过仔细的讨论,展开热烈的争论,任何人的立场和建议,其中包括列宁本人的在内都受到过批评。”^②此外,虽然由于列宁巨大的历史功绩和声望赢得了人民群众甚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推崇,但是“列宁作为一个具有极高文化素养的人,断然反对对他的崇拜的任何做法,并且经常同这种做法作斗争”^③。由此可见,列宁时期并不存在个人权力体制,再加上列宁本人对个人崇拜的强烈反感和抵制,因此所谓违背党和国家的民主原则也就无从谈起了。

(三)基本评价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也不难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开宗明义直接针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少。已有的研究成果仅有14篇学术论文和3篇硕士学位论文。第二,局部研究多,整体研究少。已有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针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某一时期、局部的研究。整体上的研究成果仅有3篇学术论文和1篇硕士学位论文。第三,零散研究多,系统研究体系尚须建构。已有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针对列宁党建思想与实践的某一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性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

三、选题核心概念界定

(一)“党风”

“党风”这一概念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及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中,恩格斯是最早使用“文风”一词的。他曾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针对卡尔·海因岑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击予以反讽时指出:“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

① [苏]A.奥库索夫:《官僚主义及克服的途径》,《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② [苏]E.维滕贝格:《论列宁反对个人崇拜》,《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11期。

③ [苏]E.维滕贝格:《论列宁反对个人崇拜》,《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11期。

风。”^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强调要坚决反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明确提到“党风”这一名词,并予以科学的概念界定,但是他们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秉持的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等等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无疑为无产阶级政党形成自己独特的作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概念范畴。应该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提出“党风”一词并加以系统论述的是毛泽东。1941年9月,毛泽东就曾在延安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党风存在宗派主义”^②。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党风”一词。随后在作为整风重要文献的《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③。再者,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其《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总结提炼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工作作风,即理论联系实践的作风、和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重要标志。最后,在民主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为了避免重蹈胜利后因骄傲而不思进取从而导致失败的历史覆辙,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保持“两个务必”的警示,即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作风内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风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把党风的范畴明确规范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五个方面。这为本书研究框架的建构和内容的整合提供了有力的铺垫和支撑。

(二)国内对“党风”概念的不同定义

截至目前,国内对“党风”这一概念的定义有如下8种:

1. 党风是“政党的作风,党性的外在表现”^④,而党性是“政党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⑤。
2. “党风是党的世界观的表现。”^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④ 《辞海》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1页。

⑤ 《辞海》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2页。

⑥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编:《党的建设教学大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